

Z 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zhengzhixue jiaoxue yu yanjiu congshu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 朱新山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Z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Zhengzhixue Jiaoxue Yu Yanjiu Congshu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 朱新山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朱新山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9412-1

I. 中… II. 朱…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709号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朱新山 编著
责任编辑/马晓俊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6 千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12-1/D·607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编 传统中国

第一章 小农中国	9
第二章 帝学中国	28
第三章 儒教中国	63
第四章 士人中国	74

第二编 转型与重铸

第五章 社会危机与整体转型	91
第六章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112
第七章 从差序格局到平权格局	130
第八章 从为民做主到人民民主	145
第九章 从权力政治到政治文明	165
第十章 从官本到人本的文化建设	188
结 语	203
建议阅读书目	206

引 言

一、写 作 缘 起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一门前沿性课程,在复旦大学(先作为研究生的讨论课,后延及本科)、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作了探索性开设,国内至今尚无教材。该课在上海政法学院开设已五年,授课老师主要根据研究心得,自制讲义,展开学习讨论。

记得可能是 1995 年,现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臧志军教授为我们开设此课,他开列了包括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内的 10 多本经典书目,我们一路研读过来,颇感引人入胜。自此,笔者开始有了系统认识中国社会的想法,甚至萌生了写本与此相关的小书的念头。然而,事后看来,此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细致研读的结果是,感觉此事困难颇大。究竟如何下笔,形成什么样的框架,颇费踌躇。其后,此事经历了多次反复,一晃十几年过去,始终难成正果。

还好,两年前学校将“中国社会政治分析”列入教育高地建设规划。这就促使笔者系统整理十多年来的研究思路,以便尽快理出头绪来。此最终结果即为一部研究型教材,或谓专著型教材,权作今后上课讨论之基础与框架。



二、结构与特色

写作此书是笔者系统认识中国社会的尝试。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笔者追随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先从认识中国农村起步。费孝通先生说：“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世界各国都在迈向现代化，我们也不能例外，但要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先得要求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所造成的特点。”^①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起点是传统社会，目标是走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算起，距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如从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算起也有 150 多年。目前这一艰难的社会大转型仍未完成，还在继续。很清楚，如果不能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特质，我们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如何一路走来并将走向何方。问题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笔者认为，研究时下农村社会，尤其是中西部农村，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支点^②。因为与传统社会最为相近的，就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最为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基因与特质。何况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工商社会。因此，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是反观传统社会的最好的一面镜子，也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选择。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不到农村搞调查，就不会写出作为经典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难以形成中国革命的基本思路；费孝通不到农村搞调查，就不会有著名的《江村经济》与《乡土重建》，他也难以提出破解传统中国基本问题（贫困问题）的根

①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0 页。

② 固然借助历史文献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感与经验体悟是非常重要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就是通过现实农村调查，观照研究传统中国的经典例子。

本思路,即“无工不富”。

本书在长期进行农村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当下农村观照传统中国,进而建构起传统中国社会的“理想图式”。这种传统中国的“理想图式”或韦伯讲的“理想类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文本叙事的逻辑起点。本书建构的传统中国的“理想图式”,包括“小农中国”、“帝制中国”、“儒教中国”与“士人中国”四大版块(讲版块仅是从叙述结构上讲)的组合,四者(也即小农经济、帝国政治、儒家文化、士绅社会)构成四位一体、互为强化的有机整体。传统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就是此四者构成的有机整体的整体大转型。因此,“小农中国”、“帝制中国”、“儒教中国”与“士人中国”,就构成本书第一编“传统中国”的前四章。

这样,“传统中国”的“理想图式”有了,接下来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文本叙事。本书借鉴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与许倬云先生《历史大脉络》的宏观叙事模式,以泼墨山水的手法,直接勾勒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大脉络,而不受僵化的历史分期及具体时间节点的束缚。本书认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与重铸的大脉络有:“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从差序格局到平权格局”、“从为民做主到人民民主”、“从权力政治到政治文明”、“从官本到人本的文化建设”。它们就依次构成本书第二编“转型与重铸”的第六至第十章(当然,逻辑上在本编的起始章即第五章,先交代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整体转型”问题)。

框架结构上的创意,构成本书最大的特色。当然,在本书的各个部分,笔者也尝试了力图展现政治学中国化的富有创意的努力。如在“帝制中国”一章,笔者就从“天下国家”、“政治早熟”、“打天下与治天下”、“以德治国”、“政治底色”五个层面,来系统探讨传统中国政治的形态结构与治理机制。本书的另一特色是,试图将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糅成一体,以便从中把中国的社会政治构造及其运作机制理出个道道来。然而,此绝非易事。



另外,中华民族及其社会政治成长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此问题不便列入本书的主体框架,故在本书的引言部分予以交代。

三、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分析

每一民族都有自己成长的生态环境,这一生态环境对其社会政治模式与发展道路的选择有重大影响。而且,越往前追溯,生态环境的影响就越大。

关于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周易》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①之类的全面审视生存环境的主张。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地理环境提供了历史与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学者博丹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②。孟德斯鸠甚至认为,国家制度和类型也取决于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热带民族的怯怠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他指出:“墨西哥和秘鲁的专制国家都是接近赤道的;差不多所有自由的小民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接近两极的。”^③李大钊先生则从地理纬度角度,提出了所谓的“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④很明显,这些论断都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嫌疑。固然我们不能苟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无可否认,地理环境尤

① 《易·系辞上》。

②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3页。

④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三册。

其是对一个国家的初始制度选择有重大影响。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前后贯通看来，中国历史发展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综合起来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①。

与古希腊对比，正是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迥异，中国与它们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顾准先生指出：“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或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流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②杜亚泉（笔名伦父）先生也指出，西洋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这里“交通便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而中国文明发达于黄河沿岸，这里“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这两方面的差别，导致东西方社会“全然殊异”，进而造成文化的大相分歧：西洋“以自然为恶”，“注意人为”，中国“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尊天命循天理为主”。由此派生出西洋的“主动文明”，中国的“主静文明”。“两种文明，各现特殊之景趣与色彩。即动的文明，具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静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带恬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4页。

② 顾准：《顾准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淡的色彩。”^①可以看出,希腊半岛多山,土地贫瘠,几乎不太适合发展农业。而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东部是广阔的平原,土地肥沃,黄河、长江穿流而过,水系发达,非常适合农业发展。而且,上天对中华民族也特别照顾,其所在的地域,在最热的季节降雨也最多,而不像地中海一带冬季雨量却偏多^②,这就天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文明。

另外,中华民族的成长有广阔的腹地,冯天瑜先生指出,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他说,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千米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在古代曾经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地,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但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绝不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前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这些区域的面积,当在五百万平方千米左右^③。中华民族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这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自成体系、中华文化长期绵延而不至中断,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① 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

②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③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

第一编 传统中国

本书“传统中国”的界定,取法费孝通教授在《中国绅士》一书中所用的“传统社会”概念,即指公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崩溃之后,中央君主制权力下帝国的统一时期^①。也即何怀宏先生所讲的从秦汉至晚清的“选举社会”时期,此有别于先前的“世袭社会”,国家治权开放,官员通过选举(包括“察举”与“科举”)产生^②。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形态结构,黄仁宇先生有一个形象说法,即“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③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社会在形态上,其底层结构为小农经济,上层结构为以皇帝和官僚为代表的帝国政治,而将小农经济与帝国政治上下接合起来的则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组织机制,包括儒家文化、家族组织(两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心领导力量——士人阶层组织中国的工具)等。因此,本书就从小农经济、帝国政治、儒家文化、士绅社会等方面,对传统中国的形态结构作一系统分析。

①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 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③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1页。

第一章

小农中国

农业是传统中国的立足之本和生命线。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起,小农生产方式在远古先民中就已基本成型,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产的主导方式。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与长期维持,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定居农业与差序格局

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与根本立足点。在从蒙昧时代向文明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是小农生产方式的初步确立与氏族组织形态的完善,它们是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基本模式和运动形态的最早成因之一^①。一般说来,以血缘关系组织社会是世界各地人类早期的普遍特点,然而,在随后国家的萌芽、生成的过程中,中西文明开始分叉^②。根本原因在于古代西方(如古希腊罗马)是在打破血缘关系而以地域组织为

^① 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曹沛霖教授在给博士生授课过程中,曾对中西文明分叉现象作了系统分析。



基础建立国家,而血缘关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未解体,反而不断凝固。这与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结构高度相关。这种形态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与文化形态的特质。王沪宁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实际上是从统治家族的血缘逻辑上演展而来,血缘关系构成政治权力分配和传递的基本依据,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历来贯穿着浓厚的血缘情感^①。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的“爱有差等”,实际上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结构在文化上的投影(下文详述)。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定居农业高度相关。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已进入农业定居阶段。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三口水井,凿井技术已颇为高超。井的发明大大提高了我国先民的生产、生活能力,扩大了农业定居的地域与规模。农业定居使中国较早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迅速发展起自己特有的农业文明,并建立起相应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古文明发源地之一。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可以看出,家畜饲养与制陶并未发展成为独立的畜牧业与手工业,并从定居农业的经济形态中分化出来,而是和后者紧密结合,并附属于后者,进而增加了定居农业的自给自足性质,这是中国早期社会结构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中国与西方社会文明不同的一个重要根据^②。定居农业及以农为基础、农工结合,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

以小农为基础的定居农业(小农经济与聚村而居结合),是解读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破解中国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本来,农作的分工程度很浅,无需许多人群居在一起。耕种活动至多在男女间有一

①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② 沈大德、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些分工,主要是因为在某一段时间里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然而,传统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聚村而居,可以想象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费孝通先生认为有如下理由:第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过分远;第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方便;第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第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①。然而,耕地毕竟是有限的,世代定居、人口增殖,就迫使小农经济往精耕细作方向发展。这种以小农经营为基础聚村而居的精耕细作农业,长久以来遂决定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群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②。费孝通先生指出,种地决定了小农区别于游牧或做工业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地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③。因此,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非常态。这一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影响很大。然而,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檐相接的邻居。这是源自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留存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农民聚村而居、世代定居,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熟人”社会、礼俗社会^④。

占据一定地盘,聚村而居、世代定居,人口就会以一定的血缘中心点,不断向外滋生弥散,形成有远近亲疏关系的环状族群结构(家族)。笔者曾根据某一姓氏族谱详细研究过山东中部的康村,在“大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②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④ 同上书,第8—9页。

明鼎革之际”(约 1620 年)仅有迁居到此的朱畲夫妇 2 人,然在此“根基”上人口与村庄规模不断拓展。到 1948 年即衍生到第 17 代,该村(始终为单姓村)人口计有 110 户 410 人,形成同宗 10 多个宗支并存的格局。当时,该村耕地共有 1 117 亩。再到 1997 年,人口则增殖到 250 户 775 人。全村耕地面积为 1 181 亩^①。这是一个普遍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其人口增殖很快,而人均耕地面积则不断减少。从 1948 年到 1997 年的 50 年间,人口增加接近一倍,而人均耕地则由 2.7 亩剧减到 1.5 亩。因此,在土地上不断增加劳动投入,精耕细作,是人口压力的必然结果。可以想象,中国基层社会分布着无数个类似的走向精耕细作的家族制聚居群落。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②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负责的成分,村子里的中国人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③。考古学者卜工先生指出,近万年以来的古代中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特别是欧洲大陆不同,社会的基本组织不是氏族而是家族^④。家族制在构造中国社会结构与决定中国底色上的意义重大,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极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他还说:“亡友卢康济颖悟过人,十年前尝对我说,马克思著《资本论》,于是西方社会赖以阐明;我今要著《家族论》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史……可惜书未成而身先死……这个工作,今后学术界上还需有人担负。”^⑤当然,普遍向精耕细作发展的农业已难堪人口增殖之重,这也预示了今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一是通过社会变革使稀缺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更为公正,二是大力引进与发展近现代科技,通过

① 朱新山:《康村组织变迁》,《学术交流》1999 年第 6 期。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0 页。

③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25 页。

④ 卜工:《历史选择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6 页。

⑤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76 页。

科学技术的升级不断提高农业产出。

生活在无数村落中的亿万小农，按家族制的血缘亲情原则组织起来，在社会形态上就呈现“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他经典性地描述了这种“伦理本位”社会的特点：“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姐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关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更为表示彼此亲切，加重其情与义，则于师恒曰‘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①伦理乃组织社会之本，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

费孝通先生进一步将这种以“伦理组织社会”的结构形态，从社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9—80 页。